

非理性审美世界的理性阐释和评价

——评《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

陶佳珞 昌 切

在我们看来,决定和支配20世纪人类精神文化主流向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尤其是东方不少国家历史的进程,而且还在于它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个中介延续和扩展了风行欧洲几个世纪的理性精神,从而使东方各趋向共产主义的国家相继在自己的精神文化母体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鲜血液,光大了在西欧日渐“式微”的理性传统。在近代文明摇篮中诞生,以实证科学为背景发展起来的西方近代理性传统,在其精神故里的逐步失落,有着诸种内外原因。中外许多治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把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是很有见地的。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精神重创,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崇拜。我们认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把此前居于幕后的非理性主义推向了前台。

东西方精神文化不同的主流向,内含着东西方文学和美学不同的基本趋势。在东方,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充满个性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性意蕴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无论作为精神还是创作原则,都产生了重大的实践效应,一直是20世纪前后俄苏和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和美学的主潮(需要指出,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坛曾有过一段沉寂期),而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等非理性色彩极浓的现代主义流派,虽也曾发生过一定影响,但始终未能取得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分庭抗礼的正统地位,且随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消声匿迹,只是到近10来年才略呈转机。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经由马克思主义的熔铸和民族文化的洗礼,或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被称为革命现实主义。其鲜明的理性和功利倾向,恰同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和非功利倾向构成对立的两极。而在西方,特别是在西欧,从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萨特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盛极一时,与非理性文学和美学思潮紧密呼应。即便是受科学主义影响很深的新小说,在非理性这一点上,也与其所公开反对的存在主义之类的小说脉息相通。可以说,在20世纪西方文学和美学戏台上唱主角的是非理性文学和美学,而现实主义等理性文学和美学流派只能侧身其间,不成其为主流。东西方文学和美学在时序和内容实质上的对逆演进,的确耐人寻味。

很明显,《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的作者、青年学者罗国祥教授,是牢牢把握住了西方文学和美学的基本趋势的。在这部3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虽无意全面探源溯流,原原本本揭示这一基本趋势的历史文化成因,但在具体论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美学思想时,他不止一次提及两次世界大战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在这些小说美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全书共有八章,除第一章概述20世纪西方小说以外,作者就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详细分析这些小说美学思想,仅仅把最后一章留给那些理性主义的小说流派,甚至就是这一章中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也是“欧化”了的小说流派,有的外国文学论者是把它排到后现代主义行列中去了的。作者在依次阐释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顺及垮掉

的一代和迷惘的一代)、存在主义和新小说等小说创作流派的美学思想时,自始至终紧扣非理性主义落笔,把非理性主义当作解读作品的重要角度,相当清晰地勾画出贯穿其间的非理性主线。概括或许有不周之处,详略也不尽得当,如遗漏了不少法国以外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家的小说美学思想,过于偏重法国小说美学,但这与全书的价值无损,因为即使增添这些内容,也只能更进一步验证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的非理性实质。

二

罗著紧扣非理性实质做文章,把理论的触角探入美学的基本问题,即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并在对这一问题的例析中触及到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非理性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在“前言”中,作者表现出对美学基本问题的深切关注。由“真实与真理”之辨别转向“真理”与“直觉”、“感觉的凝聚”之关联,顺势用“寓言象征”、“本体象征”和“符号象征”笼括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分章条分缕析之中,时刻不忘关照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从他对表现主义、存在主义和新小说等流派的小说美学的阐释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对20世纪西方小说中的美学基本问题的洞见。

在作者看来,“真理”有别于现实生活中实存的“真实”,是柏拉图眼中的“理式”,要获得“理式”,须借助柏拉图所谓诗人的“迷狂”。这种“迷狂”是一种排除了理智的直感体悟状态。所以,作者认为“迷狂”切近柏格森的“直觉”概念。“只是到了现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解释才将‘直觉’一词解释得和‘直觉的领悟’之含义基本一致,他说:‘人们把借以使自己置身于一种对象内部,以便与对象中唯一的,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吻合的心智感应称为‘直觉’。(见该书第5页。下引文均同于此书,只注页码)‘对象中唯一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无疑指的是‘真理’。要接近这种神秘的‘真理’,非得用‘心智感应’不可。柏格森以为‘直觉’可分为‘感性直觉’和‘超感性直觉’,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不关涉理性的艺术直觉,即‘生命冲动’的‘绵延’,而这种‘生命冲动’的‘绵延’才是同‘真理’打成一片的东西。波德莱尔欣赏的‘感觉的凝聚’,说到底,不过是‘直觉’的另一种释义。在这里,柏格森把时间(‘生命冲动’的‘绵延’)绝对化、普泛化了,用心灵的东西取代了物质的客观存在。柏格森如此,其他人本主义哲学家也不例外。尼采的‘强力意志’(又译‘权力意志’)也好,叔本华的‘意志’也好,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也好,都是作为他们哲学的始基性概念,作为生命个体本真的感性起点而‘笼天地于形(自身)内’的,因而就都典型地体现了非理性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作者说‘唯美主义小说和部分意识流小说……表现出的本质特征是主张龟缩于‘心斋’,‘坐忘’外在世界,获得一种宁静的超越,达到最高的真理’(第121页),‘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要解决在理性上帝的压制下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之间的矛盾状态,将它们统一于直觉’(第148页),证明作者是意识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美学)中历来就有“天人二分”或“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亚里斯多德等众多哲学家那里,是很容易提取出这种思维方式的。然而,在西方哲学(美学)思维路向中,也可以发现有点近似中国人道和天道一统化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前述柏拉图的“迷狂”说和柏格森的“绵延”说含有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直通宇宙“大心”的意涵,就是明证,更不用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及的那种原始思维方式了。只是在近代,这种思维方式一直被“天人二分”的思维方式挤压到暗隅处,不易为人所见罢了。也只有到上个世纪后期,随着理性主义哲学的地位逐渐下降,这种思维方式才伴随人本主义哲学泛起而重新抬头,并在20世纪成为文学和美学领域非常显赫的存在。有些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一再表现出他们对东方文化的青睐,谈“无”论“道”,恐怕原因之一就在于东方文化中那种“笼统直观”的致思特征契合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们反抗和抵制理性传统,完成向非理性主义的转换。罗国祥直接从美学的基本问题(一定意义上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切入,直逼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的思维方式,抓住了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大趋势,由此展开阐释,确能收到纲举目张的功效。

三

阐释和评价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由于对象具有显著的非理性特征,套用现成的现实主义理论,往往偏

离对象，不得要领，说些无关痛痒的大白话。这也是跨文化研究常有的难处，我们先前已有过这种教训。因此有必要调整原有理论尺度。事实上，作为东方中国的学者，罗国祥也正是这样做的，虽然做得还不尽令人满意。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收纳新潮”，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学说中有关思想加以生发性整合，提出了一种较适于评析这种特殊对象的理论主张。所持的仍是理性的唯物主义立场，却能较为恰当地运用一定的理论阐释和评价非理性的小说美学，实践效果不是时时处处都好，大体上还是不错的。

作者在“后记”中所作的理论阐发，细加探察，也许存在不少可供讨论的问题，但他阐发的理论本身，应该说还是明确和正确的。他说“小说的真实不是照相式的真实”，小说家对客观世界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包括感知、同化、选择和飞跃的运演过程，这是有根据的确当之论。他改造和利用了皮亚杰的“同化”和“顺化”的思想，同时也采纳了戈德曼有关社会经济结构和整体精神结构的思想，充实和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论。他据以阐释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新小说等流派的小说美学观，常能见微知著，揭穿他们的美学见解与创作实践之间以及其美学见解自身的矛盾，然后给出东方特色的中肯评价。他认为，尽管这些流派自称非理性和非功利，然而他们的作品偏偏内蕴着理性和功利性，这是因为，作品中的理性和功利因素，是经过复杂曲折的运演过程而呈现出来的，已经不大明显，或已“改装”、变形，须加精审才能发现。这无非是说，这些流派的作品，既是现实生活的产物，又超越而不脱离现实生活，其中仍然有着理性和功利因素。

据有这种理论主张，他对卡夫卡的表现主义作品和科林伍德的表现主义美学观之间的距离严加勘察，借用前人研究的成果，细致精到地论析了卡夫卡作品“改装”、变形的现实生活依据，和卡夫卡思想情感的社会特质，从而证明，科林伍德根本排斥理性和功利性的美学观是不能成立的。作者对新小说美学观的阐释和评价，也可为他的上述理论张本。他把结构主义理论用于阐释布托尔的《变》和萨波塔的《第一号创作》，引文，分解，组合，图示，详析阅读线索，揭示了这两部作品的“几何结构”和游戏性质。紧接着，他从《变》中挑出传统小说内容，一一说明，印证了布托尔的另一个创作意图：“展示一个异化了的现代人”（第340页）。而“萨波塔的《第一号创作》，作者的创作意图不仅在于……使读者获得进行再创作的各种可能性，而且还在于暗示人之命运的不确定性”（第339页）。显而易见，这里的小说结构是戈德曼所谓作家的精神结构的物化形式，而这种精神结构对应于社会经济结构，并不是作家个体的精神结构，更准确地说，是整体的精神结构，它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彻底超越现实生活的作品和美学思想是不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整体精神结构就象一只“看不见的手”，随时拨弄着作家手头的笔。

罗著似乎是我国第一部试图全方位论述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的专著。既要对大量小说作品作具体的美学分析，又要将各种抽象的美学理论落在作品之中，难度很大，难免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文字时显拖沓和不甚精确，从上引文即可略见一斑。再就是前后内容重复，引例过繁，甚至淹没了作者很有价值的论点，等等。如果作者用一章的篇幅扼要论述一下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总体特征，给全书定下一个基调，提示一下重心所在，给读者一个导读指南，那么，于作者和读者大概都有莫大好处。笔者，也许还有读者，希望作者能够有机会修订和完善此书，使之成为开向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的一扇更加宽敞、明亮的窗口。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焯）